

从经济社会学崛起看社会与学术发展

杨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没有人类工业社会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学就没有存在的历史和社会条件。

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等一批经济社会学家极具开创意义的作品问世，经济社会学在美国获得蓬勃发展。与发轫于社会学三巨头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的“古典经济社会学”(classical economic sociology)相区别，这一学术复兴和创新被称为“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

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更能接近事物本质

当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视角较为宏大，是美国1980年代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社会学分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必然，也是人类科学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之所以有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受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和高校组织结构的制约，而不是必然要把同一个研究对象硬生生撕裂为经济学的视角或社会学的视角。因为人类的经济生活与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活动或行为都包括了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等多个维度，因此，经济现象不一定非得由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现象不一定非要由政治学家研究，社会现象也不一定非得由社会学家研究。另外，定义各种“现象”本身就是问题，因为有些事情看似政治现象，实则为经济问题；有些事情看似经济问题，实则是政治规律在起作用。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经过多年的学科积累，不同学科的融合趋势在增强，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更能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

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也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项反击，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侵袭——其声称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解释，不管是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如社会分层、婚姻家庭、种族性别等，而社会学家也开始研究经济学的传统领域如金融市场，大公司组织，市场建构及其运作机制，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价格以及财政税收问题，等等。其实，社会学的产生与工业社会的来临及对现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说，没有人类工业社会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学就没有存在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从最早的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到后来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可以在前工业社会出现，只有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急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西欧社会，并在20世纪工业化的美国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学的三大创始人的代表作，不管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还是涂尔干的《社会的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都是通过对现代经济现象的分析所构造的庞大理论体系。

198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动荡为新经济社会学崛起奠定基础

美国的社会学开始忽略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转向社会不平等、城市化、婚姻家庭、种族、民族、性别等领域。当然，这也是由美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历史阶段的社会需求决定的，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城市化的高峰期，诞生了芝加哥城市社区研究学派；在60、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高涨的时期，社会学对社会正义、种族和性别平等的研究蔚然成风；而在80、9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和大公司的剧烈动荡及迅猛发展为经济社会学的重新兴起奠定了现实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是对经典社会学的继承和发展。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学家们对现代经济生活和商业系统的分析视角更加宽阔和细腻——很多经济社会学家受的是多学科训练，其学科背景包括社会学、哲学、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这一点从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经济社会学书目中可以一窥端倪：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1977)、

马克·米祖奇《美国公司网络:1904—1974》(1982)、安德鲁·艾博特《职业体系:论专业化劳动分工》(1988)、理查德·惠特利《东亚商业体系:企业、市场与社会》(1994)、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儿童社会价值的变迁》(1994)、布鲁斯·卡拉瑟斯《资本之城: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和市场》(1996)、安娜李·萨克森妮安《区域优势:硅谷和波士顿 128 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1996)、威廉·罗伊《社会化资本:美国大公司的崛起》(1997)、大卫·索斯凯斯《多样化资本主义: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2001)、彼得·豪与尼尔·弗雷格斯坦《市场的构造:21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2002)、布鲁斯·卡拉瑟斯《货币与信贷;社会学的视角》(2010)。

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题丰富,理论视野宏大,研究方法多样,但其核心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是统一的,即都是研究非经济因素(社会、政治、文化等)如何影响和塑造人类经济行为。哈佛大学经济社会学家道宾(Frank Dobbin)教授把复杂多样的非经济因素总结为影响和塑造人类经济行为的四种社会机制: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如惯例、习俗、传统和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社会网络、权力以及观念。

中国的市场繁荣为经济社会学发展提供空间

从社会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社会快速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型,以及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加,也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社会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是时代的召唤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银行、保险等)、劳动力市场(包括职业经理人、医生、律师等专业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巨头和跨国公司的日益涌现,以及中国高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大繁荣,为中国经济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和空间。因为这些重要市场、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会受到诸多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不但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更会对人们的就业、职业、地位、养老、婚姻、家庭、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等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持久的冲击和社会影响。因此,采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对这些事关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经济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更具有政策和现实意义。